



作者收藏的齐白石作品《蝙蝠图》

□ 李秀潭

在我的藏画中，有一幅齐白石的《蝙蝠图》。

蝙蝠之“蝠”谐音“福”，在民俗文化中有避邪趋吉、多寿多福寓意。这是白石老人晚年经常描绘的题材之一。此幅《蝙蝠图》，除了用没骨法图绘实物，还用篆书题跋“大福”，寄予人们美好愿望和祝福。这种做法由来已久，同明中期之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，文人画家迎合当时市民社会心理的历史背景有关。这幅作品创作于丁亥年，此时白石老人已是83岁高龄。他的画作，通过“衰年变法”，已入化境。其用笔老辣，墨法通妙，用极简练的笔墨，营造出浓厚的写意情趣。

齐白石，20世纪著名的中国艺术家。他历经清末、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，经历了从农民到木匠，又从木匠到文人画家，再到艺术巨匠的人生历程。他为中国艺术所作的贡献及其艺术人生，给后人极大启迪。

鲁班门下 五出五归

齐白石，湖南省湘潭县杏子坞星斗塘人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童年时只读

“为源头活水来”

——齐白石的艺术人生

衰年变法 红花墨叶

1917年，为避家乡兵匪之乱，齐白石迫于无奈，不得不作出人生最重要抉择，决定北上并定居北京。然而，在潇湘之地颇具盛名的他却在京城遭遇了冷落。以八大山人冷逸风格著称的齐白石，不为北京人赏识。当时名冠京华的画家、陈寅恪之兄、鲁迅同窗好友陈师曾独具慧眼，与他结成莫逆之交，用“画吾自画自古古，何必低首求同群”诗句，鼓励他创新画法。齐白石引陈师曾为生平“第一知己”，佩服他的艺术见解，于是决定十载关门“衰年变法”。在近十年的变法期间，他远离学习多年的八大山人，开始转向学习徐渭、石涛及同时代海派大家吴昌硕的画风，化古为我，胆识、眼光与魄力，更需要与文人画产生背景完全不同的生活阅历。明清以降，文人画已走入盛极而衰的窘境。山水画在“四王”拘古泥古的余风里兜圈子，人物画集中在文人仕女上面，花鸟画被赋予特殊寓意所束缚，中国画在取材与形式上都趋于凝固化、程式化。这是中国画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。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文人画家只晓得面对传统绢素，而不肯走向生活，失去了源头活水。齐白石艺术对于中国画的最大贡献，就是突破了这种束缚，接续了生活这个源头活水。

齐白石40岁走出湘潭，55岁定居北京，60岁才独创“红花墨叶”一派，可谓大器晚成。脱骨于文人画之藩篱羁绊谈何容易。这除需有非凡的胆识、眼光与魄力，更需要与文人画产生背景完全不同的生活阅历。明清以降，文人画已走入盛极而衰的窘境。山水画在“四王”拘古泥古的余风里兜圈子，人物画集中在文人仕女上面，花鸟画被赋予特殊寓意所束缚，中国画在取材与形式上都趋于凝固化、程式化。这是中国画发展面临的严重困境。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文人画家只晓得面对传统绢素，而不肯走向生活，失去了源头活水。齐白石艺术对于中国画的最大贡献，就是突破了这种束缚，接续了生活这个源头活水。

齐白石是一位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艺术家。他有着丰富的生活积淀和勤勉的艺术求索精神。在逐步走上艺术道路之后，他又注意完善丰富自身文化素养，所以他既能够突破传统文人画家身份的束缚，也能够超越民间画匠沿袭模仿的惰性，把艺术与现实生活和人生结合起来，潜心于尽抒己意的墨趣。他作画追求的是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

世”。他塑造出来的以虾为代表的系列经典艺术形象，大大深化了对于生命质感的表现，丰富了中国画艺术的美学内蕴。他的人物画则善于传达描绘对象的神情与内心变化，并常具有漫画式讽刺意味，针砭时弊，借物抒情。特别是齐白石将古代文人不屑描绘的日常生活、蔬果水族、禽鸟草虫、花木杂物纳入绘画艺术之中，自成一格，自为一体。不仅大大拓展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创作题材，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传统文人画家超凡脱俗、孤芳自赏的狭隘意识，拓展了艺术的意境和情趣，表达了中华民族生机盎然的生存境界，以及开朗、刚健的内在生命力。

“为源头活水来”。这是齐白石之所以能胜出同时代画家，成为艺术大师的过人之处，也是他从文人画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。他也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
赤子之心 平民情怀

齐白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也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最痛苦的时期。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齐白石饱经离乱之苦，加之他的复杂遭际和细腻的情感，诸多关于人生的感慨都在他身上得到体现，这都成为齐白石艺术主题的渊源。纵观齐白石的艺术人生，既有对世俗生活的体验，也有对田园故里的思念，还不乏对生存之道的沧桑感慨，以及对国泰民安、和平生活的祈愿。但贯穿其中最鲜明的特点，则是赤子之心和平民情怀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十分推崇“大人物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”。齐白石一生饱经世事沧桑，但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率直善良、纯真不伪、本色自然的赤子之心。他以一种童心般的新奇和纯真面对这个世界，用画笔诠释不受世间凡尘污染的艺术本真。白石老人能以百物入画。无论是农具的柴爬，读书的砚台，还是偷油的老鼠，熬煮的红蟹，都能成为他的画中之物。且白石老人诙谐风趣的性格，总能将人们日常之所见，融以独特的



视角，使作品灵动有趣，令人看后会心一笑。试看老人画的河虾，用墨色浓淡变化表现虾躯体的透明质感，通过虾须变化展现虾在水中游动的姿态；他画的草虫，那两根敏锐的触须，有一触即动的感觉；他画的墨蟹，有蟹爪硬度的立体感和茸毛的质感；他画的蜜蜂，观者仿佛能听到飞动翅膀的嗡嗡声。这些无不充满了勃勃生命朝气和天然童真之趣。这充分体现了“大人与赤子”在齐白石身上的完美结合。

齐白石一生“为百虫写照，为百鸟传神”，绘尽人间万象。其创作之丰，涉猎之广，可谓集中国艺术之大成。而其中最突出的主题，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的眷恋，充盈着一种世俗生活的平民情怀。齐白石后半生，虽然居住在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都北京，笔耕砚田，以卖画为生，但他的创作素材仍离不开早年农村生活的农具果蔬和田园花鸟，忘不了亲情、友情及故乡之情。所画之物，凸现了农家情趣与乡野气息，透露的是农民的质朴与乐观，引以为豪的是“蔬笋气”与故园情。也正是这种浓厚的平民情怀，使得白石老人的艺术获得了无数草根中国民众的喜爱，成为我国妇孺皆知、耳熟能详的人民艺术家。

齐白石大师命运蹉跎，出身贫微，但他从不自卑，且以本色为荣。即使日后成为书画大家，声名大噪，

仍不忘本色。作品常署名铃印“木人”“木居士”“鲁班门下”“我草木众人也”等。他有一方闲章，印文为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”，即是他不求功名、甘于平民身世的表白，同时也是他留给子孙的一句传家箴言。初游西安时，时任西安桌台的范增祥想引荐他去做慈禧的御用画师，被他婉拒。后来在北京，好友又为他捐个县丞，他也坚辞不就。抗战期间，北平沦陷，齐白石闭门谢客，辞去教职，出示“画不卖与官家”告白，表现出高尚民族气节。正是这种不事权贵、淡泊自甘的远大志向，铸就了一代艺术大师的高尚品格。

南宋理学大师朱熹，抒发观书体会的哲理诗《观书有感》名句：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揭示了治学及艺术之道精髓。回顾世纪老人齐白石的艺术人生，他艺术创新的基本路径就在于生活。他把中国画的根柢向民间与世俗，抓住了现实生活这个根本。他是真正从中华民族现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大师。齐白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，他所秉持的艺术理念，他的平民画师的从艺心态，不仅为20世纪中国画界树立了艺术圭臬，也为当代艺术家提供了人生鉴范。

未已斋札记

何武公正执法

□ 刘立祥

何武（？—3年），字君公，蜀郡郫县人，西汉大臣。历任郫县县令、宛州刺史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等职，封洮乡侯。何武几十年宦海沉浮，其克己奉公、公正执法的事迹千古流传。

秉公克己

何武早年拜博士为师学习《易经》，学得满腹才学，以明经射策入仕，被选入朝中做了郎官。由于奉职恭谨，政绩优异，被擢升为郫县县令。

何武的弟弟何显有商人户籍，生意做得很大，获利相当丰厚，却倚仗权势不缴纳赋税。县里一连几次税务官征收老百姓的赋税都如狼似虎，但都畏惧何家的势力，何显一文不缴，他们却从不敢去上门催缴。

新任税务官求商却是个急公好义的人，一改前任畏避权贵行政不作为的态度，甫一上任便跟何显杠上了。他不仅丝毫不留情面，一日三上门，向何显催缴赋税，而且出手不凡，敢放大招。在一次催缴赋税时，何显有位家人出言不逊，求商立即将其逮捕。

何显顿觉颜面丢尽，勃然大怒，找到哥哥何武，痛陈自己所受“委屈”，鼓动哥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芝麻税务官。何武听完弟弟的陈述，冷冷地说了句“以吾家祖赋繇役不为众先，奉公吏不亦宜乎”！事情之所以如此糟糕，是因为我们家交租赋服徭役没有走在众人前头，务要克己奉公，作为奉公守法的官吏难道不应该这样吗？

结果，何武不但没有答应弟弟的请求，倚仗权势施行报复，整治求商，反而向太守举荐了求商，对求商

的无私无畏秉公执法大加赞赏，太守则欣然采纳。

露章奏劾

汉成帝诏举贤良方正，太仆王音推荐何武，何武应召对策，成绩优异，被擢升为谏议大夫。不久，又升任扬州刺史。当时，刺史是直接受朝廷委派巡行郡县的中央监察官，所谓代天子巡察天下的钦差大臣，官秩虽不太高，却地位显赫，威风八面。

何武纠举禄秩两千石级的高官，一定要实行露章奏劾。所谓露章，即故意公开奏章纠举内容，使被弹劾的人闻而服罪收手。何武露章奏劾不法官员，对于那些真心服罪表示愿意悔改者，针对不同情况，或者减轻处罚，或者免于惩处；而对于那些一意孤行，不收敛不收手者，则一查到底，加重责罚，严惩不贷。

何武的严格执法使得不少官员畏惧异常，也引来不少非议。

九江太守戴圣，史称“小戴”，与其叔戴德合称“大小戴”，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，是儒学经典《小戴礼记》（即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）的编撰者，是当时享有盛誉的耆老鸿儒。按理说，这样一位声名远播的饱学之士主政一方，应当政清人和，百业俱兴，令人失望的是这个戴圣为官行政，随心所欲，不遵守法令，甚至徇私枉法，为所欲为，民众怨声载道。因为戴圣是声震遐迩的大儒，当时的刺史就网开一面，宽容了他。

何武接任刺史以后，不像前任刺史那样投鼠忌器，偏袒戴圣，将戴圣属下违法犯罪者悉数捉拿归案。戴圣

对何武的行政举措颇不以为然，阴阳怪气地讥讽道：“乳臭未干的小后生，呵呵，他懂什么，除了给别人添乱，还有什么本事！”面对戴圣的无端攻击，何武稳若泰山，不做任何回应，依然一如既往地开展工作。属下官员在例行工作中发现了戴圣徇私枉法的罪行，并且很快掌握了全部罪证，然后向他“露章”——派人私下把罪证透露给他。

戴圣害怕了，只好自己主动辞官了事。然而，戴圣丢掉了九江太守的职位，此后不久，却又凭借其名入效应，在朝廷做了博士。这戴老夫子绝对是说一套、做一套，心胸又不怎么开阔的斗筭之人，时过境迁，胸中却还一直憋着对何武的满腔怨气，愤愤难平，来了个“到处逢人说何武”，极尽污蔑诽谤。

有人将这事告诉了何武，何武一笑置之。

不曾想冤家路窄，没过多久，戴圣的儿子因其实家聚为群盗，为害一方，被官吏捕获，拘囚在庐江郡衙，按照当时的法律，可杀可不杀。戴圣闻之，不由顿足捶胸，因为庐江是何武的管辖范围，儿子犯此重罪，又载在何武手中，料想儿子必死，便每天在烦躁不安中默默地等待着儿子的死讯。

但是，何武又一次使戴圣“失望”了，他依法公平地对案件进行审判，没有判处戴圣的儿子死罪。“自是后，圣惭服。武每奏事至京师，圣未尝不造门谢恩。”

威武不屈

何武在扬州做刺史5年，奉调入

京做了丞相司直，后又出任清河郡太守。大司马曲阳侯王根推荐何武，征召他做了谏大夫，又出任宛州刺史，后再次奉调入京任司隶校尉，调任京兆尹。两年后，何武因所荐举的人犯罪，受到牵连，被贬为楚国内史，后又升任沛郡太守，再又入京被擢升为廷尉，转任御史大夫（后改为大司空），封洮乡侯，后又调任前将军。

元寿二年（公元前1年），汉哀帝刘欣诏令举荐太常。太常是朝廷掌宗庙礼仪之官，位居九卿之首，地位十分崇高。王莽巴望能得到这个职位，便在满朝文武中寻觅荐举人，寻来觅去，认为何武的声望最高。于是，王莽找到何武，何武却断然拒绝。

从此，王莽与何武结下梁子。同年六月，哀帝驾崩，太后王政君当日召王莽入宫，收回大司马董贤的印绶，命群臣举荐大司马人选。大司徒（丞相）孔光等官员都推荐王莽，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却不肯附和孔光等人的意见。

何武与公孙禄是好朋友，两人都认为以前惠帝、昭帝两个年幼的皇帝在位的时候，吕氏、霍氏、上官氏外戚集团把持朝政，权倾朝野，几乎倾危社稷。现在成帝、哀帝连续两代没有继嗣，应当推举皇帝亲近的德高望重的大臣来辅佐幼主，不能重蹈覆辙，让异姓外戚集团当朝弄权。因此，何武推举公孙禄做大司马，而公孙禄也推举何武做大司马。

太后王政君最终起用王莽做了大司马。

何武一再给王莽添堵，王莽岂肯罢休，遂示意有关部门奏劾何武、公孙禄相互荐举之罪，两人都被免官。

王莽的势力渐渐强盛起来，成一

手遮天之势。元寿二年（公元前1年）九月，王莽拥立年仅9岁的娃娃汉平帝刘衎继位。自此，王莽号称“安汉公”，代理朝政，大权独揽。为了尽快实现篡汉自立的野心，对于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的汉廷忠直之臣，王莽千方百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打击，栽赃陷害，必欲置之于死地，短短数月，数百人被冤死。原始三年（公元3年），大理丞槛车征召何武，何武自知已无法逃脱王莽的魔掌，被逼自杀。

品评

何武宦海沉浮几十年，仕途坎坷，数度被革职或贬谪，然无论是在朝在野，也无论是做平头百姓、基层小吏还是贵为三公，频繁变换的是职务或岗位，始终不变的是胸中激荡着的凛然正气，是忧国忧民的热血衷肠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追求。据《汉书·何武传》，“武为人仁厚，好进士，奖称人之善”，“然疾朋党，问文吏必于儒者，问儒者必于文吏，以相参验。欲除吏，先为科例以防请托。其所居亦无赫赫名，去后常见思。”他居于某个职位上的时候，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一旦离职而去，其德政和功绩便显现出来，从而引起人们的无尽思念。

是所谓“民意闲谈中，政声人去后”。

